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6)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 国 家 与 革 命

(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与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sup>1</sup>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中的译文排印。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开本  $850 \times 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3\frac{3}{4}$  · 字数 20,000

1949年8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6版

1960年9月北京第8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21 定价（四）0.33元

# 目 录

初版序言 .....	1
再版序言 .....	2
<b>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b> .....	3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	3
2. 特别的武装队伍, 监狱等等 .....	6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	9
4. 国家“消亡”和暴力革命 .....	12
<b>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b> .....	18
1. 革命的前夜 .....	18
2. 革命的总结 .....	22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	28
<b>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b>	
马克思的分析 .....	30
1. 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	30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	34
3. 议会制的消灭 .....	38
4. 民族统一的建立 .....	44
5. 消灭寄生虫式的国家 .....	47
<b>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b> .....	48
1. “住宅问题” .....	49

2. 同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	52
3. 給倍倍尔的信 .....	56
4. 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批判 .....	59
5. 1891年为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 .....	65
6. 恩格斯論民主制的消除 .....	71
<b>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 .....</b>	<b>73</b>
1. 馬克思对这个問題的提法 .....	73
2. 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	76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	81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 .....	84
<b>第六章 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b>	<b>91</b>
1. 普列汉諾夫与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	92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論战 .....	93
3. 考茨基与潘涅庫克的論战 .....	100
初版跋 .....	109
注释 .....	110

## 初版序言

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大大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同擁有無限權力的資本家集團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殘酷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家（我們在這裡是指這些國家的“後方”而言）已經變成了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工監獄。

連綿不斷的戰爭造成的空前慘劇和災難，使群眾生活困苦不堪，使他們更加義憤填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所抱的態度，已經成為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了。

在幾十年較為和平的發展中積聚起來的機會主義成分，使得社會沙文主義流派在世界各個正式社會主義政黨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個流派（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魯巴諾維奇以及不太露骨的策烈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在德國有謝德曼、列金、大衛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列諾得爾、蓋德、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海德門和費邊社分子<sup>2</sup>等等）口頭上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沙文主義，其特點就在於這些“社會主義領袖”不僅對於“自己”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採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態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大國早就在剝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帝國主義戰爭也正是為了瓜分和重分這些

賊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在“国家”問題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見，就不能展开斗争，不能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首先，我們来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說，特別詳細地談談这个学說被人遺忘或遭到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各个方面。其次，我們要專門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說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可耻地遭到徹底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領袖考茨基。最后，我們要給俄国1905年革命、特別是1917年革命的經驗，做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現在（1917年8月初）大概正在結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認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社会主义無产阶级革命的鏈条中的一个环节。無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向群众說明，为了使自已从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来，他們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因此这个問題不仅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

作 者

1917年8月

## 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时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节。

作 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 第一章 階級社会和国家

### 1. 国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階級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階級总是不断迫害他們，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对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企圖把他們变为無害的神像，即所謂把他們偶像化，赋予他們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階級，同时却閹割革命學說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馬克思主义作的这种“修改”是一致的。他們遺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學說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馬克思主义者”（請不要笑！）。那些德国的資產階級学者，昨天还是摧殘馬克思主义的专家，現在却愈来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来了，仿佛馬克思培育極有組織的工人协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馬克思主义的風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們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學說。为此，必須引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許多話。当然，很多的引証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沒有这样的引証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論到国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



地方，我們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証，一方面使讀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創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發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鑿地証实并指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們現在先从传播最广的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講起，這本書于1894年在斯圖加特印行了第六版。我們必須根据德文原著譯出一段引文，該書俄文譯本虽然很多，但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分析时說：“国家决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或‘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發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調和的对立面而又無力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經濟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级不致在無謂的斗争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駕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緩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六版第177—178頁）<sup>3</sup>

这一段話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調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說，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調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根本問題上，人們从两个主要方面来歪曲馬克思主义。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迫於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而不得不承認，只有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他們又來“改正”馬克思，說國家是階級調和的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國家就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在市儉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言論！）看來，國家正是用來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衝突得到緩和。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來，秩序正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緩和衝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工具和手段。

例如，在1917年革命的時候，對國家的意義和作用的看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需要在实践中立刻行動，而且是大規模行動的問題，全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這個問題上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國家”“調和”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這兩個政黨的無數決議和他們的政治家的許多論文，都浸透了這種市儉的庸俗的“調和”論。國家是—定階級的統治機關，這個階級決不能與同它對立的一方（同它對抗的階級）調和，這一點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了解的。在對待國家的態度問題上，再明顯不過地表明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什維克向來就這樣說），而是唱准社會主義高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論上”，它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或抹殺了以下一點：既然國家是

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可。这个结论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们看到，这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分析后得出的绝对肯定的结论。正是这个结论（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说明）竟被考茨基……“遗忘”和歪曲了。

## 2. 特别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又说，……“国家同旧的氏族（或宗族）组织不同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按地域来划分它统治下的国民”……

我们现在看来，这种划分是“很自然的”，但这是同宗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长期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特征，就是社会权力的建立，这个权力已经不是自己组织成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别的社会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或阶级以后，已经不可能有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了…… 这个社会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还有监狱、各种强制机关等物质附属机构，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氏族社会制度所没有的”……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由社会中产生而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国家这个力量的概念。这个力量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别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别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经不是武装的居民，不是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了。

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樣，恩格斯竭力促使覺悟工人注意的，正是盛行的庸俗觀念認為最不值得注意、最習以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說是頑固不化的偏見奉為神聖的那些東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工具，但是——難道可能不是這樣嗎？

19世紀末葉，絕大多數歐洲人認為，這是不能不這樣的。恩格斯的話正是對這些人說的。他們沒有經歷過，也沒有親眼看到過一次偉大的革命，他們完全不了解，什麼是“居民自動組成的武裝”。對於為什麼要有駕於社會之上並使自己同社會脫離的特別武裝隊伍（警察、常備軍），西歐和俄國的庸人總是喜歡借用斯賓塞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幾句話來答復，說這是因為社會生活複雜化、职能分化等等。

這種說法似乎是“科學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蓋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這個主要的基本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種分裂，“居民自動組成的武裝”同使用棍棒的猿猴群、原始人類，或宗族社會的原始組織比較起來，只是程度上複雜些，技術上高明些，但這樣的武裝組織是可能的。

這樣的組織之所以不可能有，就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為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如果這些階級都有“自動組成的”武裝，那在它們之間就一定會展開武裝鬥爭。於是國家形成了，特別的力量、特別的武裝隊伍建立起來了。每當革命破壞國家機關的時候，我們都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是如何力圖恢復替它服務的特別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是如何力圖建立一種不替剝削者服務，而替被剝削者服務的新型組織。

上面恩格斯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即每次大革命在實踐中明顯地而且是以大規模的行動提到我們面前的問題，正是“特別”武

装队伍同“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們再来看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的时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社会权力是薄弱的（这里指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的例外，以及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說来，它是在加强；

……“社会权力是随着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化及邻国的扩大和人口增多而加强起来的。拿現在的欧洲來說，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把社会权力提高到可以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整个国家的地步”……

这段话至迟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写于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大银行的無限权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來說，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因为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世界已被这些“互相竞争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盗国家瓜分完了。从此海陆军备無限增长，1914年至1917年英德两国为了爭夺世界霸权、为了瓜分贓物而进行的强盗战争，使社会上一切力量几乎都被强盗国家政权“吞沒”，使情况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們在1914年至1917年，正当这个竞争加剧了許多倍并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却用“保衛祖国”、“保衛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詞句来掩盖他們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 3. 国家是剝削被压迫階級的工具

为了維持駕于社会之上的特別社会权力，就需要捐稅和国債。

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稅权，他們就成為社会机关而駕于社会之上。从前人們对氏族(或宗族)社会机关的那种自願的敬意，即使他們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个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氏族代表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軍权的首腦，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氏族首領表示羡慕。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問題。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問題：究竟什么东西使他們駕于社会之上？我們下面就会看到，1871年巴黎公社如何实际地解决了这个理論問題，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因为国家是为了控制階級对抗而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种階級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国家，这个階級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获得了压制和剝削被压迫階級的新手段”……不仅古代的和封建国家是剝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現代的代議制的国家也是資本剝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是也常有一些例外，如相互斗争的階級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国家政权暂时获得某种独立性，似乎成了这两个階級之間的中介人”……17世紀和18世紀的君主专制，法国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拿破侖主义，德国俾斯麦时代，都是如此。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在共和制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開始壓迫革命無產階級以後，由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蘇維埃已經軟弱無力，而資產階級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直接解散蘇維埃的時候，也是如此。

恩格斯又說，在民主共和國內，“財富是間接地發揮它的權力的，因此是更可靠的”，它所採用的第一個方法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第二個方法是“政府同交易所結合”（法國和美國）。

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國中的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都把這兩種維護和實現財富的無限權力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國實行民主共和的头幾個月里，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兩種“社會主義者”同資產階級聯姻的“蜜月”期間，帕爾欽斯基先生在聯合政府中實行怠工，不願意實施制裁資本家、制止他們進行掠奪和借軍事訂貨盜竊國庫的種種措施，在帕爾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樣的人），資本家“獎賞”給他年薪 12 萬盧布的肥缺，試問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買，還是間接的收買？是政府同辛迪加勾結，還是“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切爾諾夫、策烈鐵里、阿夫克森齊也夫、斯柯別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麼作用？他們是盜竊國庫的百萬富翁的“直接”同盟者，還是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

“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度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度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通過帕爾欽斯基、切爾諾夫、策烈鐵里之流）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可靠十分鞏固地確立自己的權力，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機關

或政黨的 任何 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

還應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認為，普選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他顯然是估計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長期經驗，他說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的指標。在現代國家中，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都希望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這種荒謬想法，似乎普選制“在現代國家中”真正能夠體現大多數勞動者的意志，並保證實現這種意志。

我們在這裡只是指出這個錯誤的想法，只是指出，恩格斯這個十分明確而具體的說明，經常在“正式的”（即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宣傳鼓動中遭到歪曲。至於恩格斯怎樣揭露這種想法的全部虛偽性，我們以後在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現代”國家的看法時，還會詳細地加以闡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總結如下：

“由此可見，國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政權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幾個階級時，國家就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以迅速的步伐走上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已經沒有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必然會消失，正如它們從前必然會產生一樣。隨着階級的消失，國家也必然會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



“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派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看到，即使引用也多半是为了崇拜偶像，也就是说，为了正式表示对恩格斯的尊敬。他们根本不去考虑，先要经过怎样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甚至他们往往不懂恩格斯说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 4. 国家“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话是非常著名的，经常有人引证，它清楚地表明了目前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把戏的本质，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加以说明。现在我们把这句话的出处的那一整段论述转录如下：

“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就消灭了自己之为无产阶级，就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同时也就消灭了国家之为国家。过去和现在在阶级对立中向前发展的社会，需要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其生产的外部条件，特别是用强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以内。国家曾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的集中组织形态，但是国家所以成为这样，只是因为它是当时唯一代表整个社会的阶级的国家。在古代，它是奴隶主即国家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它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最后真正成为全社会的代表时，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多余的东西

了。那時候，必須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已不存在，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現象以及目前生產無政府狀態引起的生存鬥爭已不存在，這個鬥爭中的衝突和過火行動（極端化）也隨着消失，再沒有什麼東西須要鎮壓了，於是，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國家也就不需要了。國家作為全社會的真正代表而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名義占有生產資料，也就是它以國家資格所採取的最后一个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涉，便會逐步成為多餘的東西而自行停止。對人的管理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指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該根據這一點來評價‘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句話，這句話用來鼓動暫時還可以，但畢竟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根據這一點來評價所謂無政府主義者要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反杜林論”德文第三版第301—303頁）<sup>4</sup>

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在恩格斯這一段思想極其豐富的論述中，只有與無政府主義“廢除”國家的學說不同的國家“消亡”（馬克思語）這一點，被現代社會主義政黨當作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接受下來了。這樣來割裂馬克思主義，無異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機會主義，這樣來“解釋”，就只會留下一個模糊的觀念，似乎只有緩慢的、平靜的、逐漸的變化，而沒有突變、風暴和革命。對國家“消亡”最普遍、最流行、最大眾化的（如果能這樣說的話）理解，無疑是抹殺革命，甚至是否認革命。

但是，這樣的“解釋”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粗暴的歪曲，僅僅有利於資產階級。從理論上說，產生這種歪曲的根源就是忘記了我們上面全部摘引的恩格斯的“總結性”論述中也指出的極重要的情

况和观点。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一开始就说，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也就消灭了国家之为国家”。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照例”是不加思索的，他们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认为这是恩格斯的“黑格尔主义的毛病”。其实这几句话扼要地表明了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經驗，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詳細地加以論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講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他講的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別力量”，恩格斯下的这个絕妙而極其深刻的定义是十分明确的。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豪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別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別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国家之为国家”。这就是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資料的“行动”。显然，以无产阶级的“特別力量”来代替资产阶级的“特別力量”，这样一种更换是决不能靠“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在談到“自行消亡”和更鮮明更光輝的“自行停止”一語时，他十分明确而肯定地说，这是指在“国家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資料”以后，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情。我們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徹底的民主制。但是那些無耻地歪曲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

里所说的就是民主制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制也是国家、在国家消逝时民主制也会消逝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最彻底的民主国家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但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

可以担保，在1万个读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的人中，有9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记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余的10个人中可能有9个人不懂得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懂得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就是这样记载的！伟大的革命学说就是这样被人偷偷地改成了流行的庸人主义！人们千百次地重复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把它庸俗化并简单地装到头脑中去，形成了固执的偏见。至于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却被抹杀和“忘记”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只是市僧式地夸大了民主制的概念，没有丝毫政治内容。既然人们当时可以合法地利用这个口号来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一般国家的批评。我们拥护民主共和国，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对无

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們决不能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別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們党內的同志解释这一点。

第五、在恩格斯这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記得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論述以外，还談到了暴力革命的意义。恩格斯对于革命的作用的历史评价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頌揚。但是，“誰都不記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現代社会主义政党內是照例不談、照例不想的，在群众中进行的日常鼓动宣传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个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論是密切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

請看恩格斯的論述：

……“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是替任何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舊社会接生的产婆（馬克思語），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开辟道路并破坏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和手段，——关于这一切，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沒有提到。他仅仅带着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为了推翻剝削者的經營制度，暴力也許是必要的（你們看，真可惜！），而任何暴力的采用，据說都会使采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尽管在每次革命胜利以后，道德和思想都有显著的提高，他还是說出了这种話！而且这是在德国說的，当时德国人民可能被迫进行暴力冲突，發生这种事件的好处至少是可以排除三十年战争的耻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气。难道可以把这种灰色的、萎靡不振、軟弱無力的僧侶思想，推荐给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嗎？”（“反杜林論”德文第三版第193頁，第二

## 編第四章末)①

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年起至1894年他逝世时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頌揚暴力革命的論点，同国家“消亡”的理論結合起来呢？

人們往往用折衷主义，用無原則地或詭辯式地任意(或者为了討好当权者)抽出前者或后者的办法把它們結合起来，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正是把国家“消亡”論摆在首位。用折衷主义代替辯証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書刊中对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見最普遍的手法。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奇，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常見的。把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辯証法是最容易欺騙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趋势，各方面的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發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分析。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对資产階級国家說的，在下面我們还要更詳尽地說明这一点。資产階級国家由無产階級国家(無产階級专政)代替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規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頌揚同馬克思的屢次声明完全符合(我們可以回忆一下，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sup>5</sup>和“共产党宣言”<sup>6</sup>这两部著作的結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我們还可以回忆一下，約在30年以后，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綱領批判”<sup>7</sup>中，曾無情地抨击了这个綱領表現的机会主义)，这种

① “反杜林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0頁。——譯者注

頌揚決不是“迷戀”，決不是誇張，也決不是論戰仗倆。必須不斷教育群眾，使他們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而且只能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础。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現在這兩個流派都把這方面的宣傳和鼓動忘記了。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必須通過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革命形勢，分析每一個革命的經驗教訓時，總是詳細而具體地發揮了他們的這些見解。我們現在就來談談他們學說中這個最重要的部分。

## 第二章

### 國家與革命 1848—1851 年的經驗

#### 1. 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初著作“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恰巧是在 1848 年革命前夜寫成的。由於這種情況，這兩本書除了敘述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具體的革命形勢。因此，我們來研究這兩部著作的作者在做 1848—1851 年革命經驗的總結以前關於國家問題的言論，也許更為恰當。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道，……“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沒有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

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1885 年德文版第 182 頁）<sup>8</sup>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 年 11 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来同这一段关于国家会随着阶级消灭而消逝的思想的论述比较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当我们叙述无产阶级发展中最一般的阶段时，我们探讨了现存社会里多少带有隐蔽性的国内战争，一直到这个国内战争变成公开的革命，那时无产阶级就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直译是提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量迅速地增殖生产力总量。”（1906 年德文第七版第 31 頁和 37 頁）<sup>9</sup>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的思想，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人遗忘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各正式社会民主党最流行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从来没有解释过。它恰巧被遗忘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制和平发展”的一般机会主义偏見和市儈幻想。



無产階級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說馬克思的学說就是如此，但是“忘了”补充：馬克思認為，第一、無产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国家，即需要建立一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無产階級”。

国家是特殊的权力組織，是用来鎮压某一个階級的強力組織。無产階級要鎮压的究竟是哪一個階級呢？当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产階級。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鎮压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鎮压的只有無产階級，因为無产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够團結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去反对資产階級并把它完全鏟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为了極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絕大多數人民。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为了徹底消灭一切剝削，也就是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極少数的現代奴隶主——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产階級民主派，这些以幻想階級妥协来代替階級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們不是把改造設想为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是設想为少数馴順地服从那意識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資产階級空想同認為国家是超階級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际上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階級的利益，法国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革命的历史已經表明了这一点，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資产階級內閣的經驗也表明了这一点。

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

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把它貫徹到政权学說、国家学說之中。

只有無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因为無产阶级生存的經濟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統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無产阶级联合、团结和組織起来。只有無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經濟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的領袖，这些被剝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剝削、压迫和蹂躪往往比無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們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說，必然会承認無产阶级的政治統治，承認無产阶级专政，即承認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無产阶级变为統治阶级，变为能够鎮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命反抗、能够組織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經濟制度的統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無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权力組織，强力組織，为的是鎮压剝削者的反抗和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無产阶级来“組織”社会主义經濟。

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教育無产阶级的先鋒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领导建立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剝削劳动者在沒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設自己社会生活的事業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領袖。反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資优

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稀飯而出卖长子的权利，即放弃权利不当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領袖。

“国家即組織成为統治阶级的無产阶级”，——馬克思的这个理論同他关于無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現是無产阶级专政，無产阶级的政治統治。

既然無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强力組織，那末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結論：不預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組織。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結論，馬克思在总结 1848—1851 年革命的經驗时也就談到了这个結論。

## 2. 革命的总结

关于这个使我們感到兴趣的国家問題，馬克思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中总结 1848—1851 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还在前进中不断鍛炼自己。它在有条不紊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拿破侖第三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完成了准备工作的前半，現在正在完成后一半。它首先使議会权力臻于完备，以便有可能推翻这个权力。現在，它已經做到了这一点，它就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行政权力达到最純粹的表現形式，孤立起来，成为自己面前唯一的靶子，以便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行政权力”（着重号是我們加的）。“当革命完成后一半准备工作时，欧洲就会跳起来欢呼說：老田鼠挖得好呀！”

这个行政权力拥有庞大的官僚組織和軍事組織，拥有極复杂的人為的國家機器，拥有 50 万官吏队伍和 50 万軍隊——这个像密网一样纏住法國社会的軀体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即封建制度崩潰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集中制，“但同时又扩大了政府的职权范围，增加了行政人員。拿破侖完成了这个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实行更大的分工以外，沒有增加任何新东西”……

……“最后，議會制共和國在其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以外，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不得不使國家权力更加集中。迄今一切政变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着重号是我們加的），“那些爭奪統治权的相互更替的政党，把夺取这个庞大的國家建筑看成是自己胜利时的主要战利品。”（“拿破侖第三政变記” 1907 年汉堡德文第四版第 98—99 頁）<sup>10</sup>

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論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該書中，國家問題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問題已經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結論：过去一切革命使國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毁的。

这个結論是馬克思主义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正是这个基本的東西，不仅被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遺忘，并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們下面還要講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做了一般的歷史总结，使人們認識到國家

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来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是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他拿1848—1851年革命伟大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面临着各被压迫阶级独立行动的时候，国家机关如何改变，如何演进？无产阶级对这个国家机器的任务怎样？

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集中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关，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的这两个机器，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由于亲身的体验，现在已经领会到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很深刻地领会到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不是愚蠢地、轻率地否认这一点，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但是忘了做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軍是資產階級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蝕着这个社会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目前在正式社会民主党內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認為把国家看作一种 寄生机体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这样来歪曲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把“保衛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辯护粉飾的市俗，当然是有很大好处的，然而这畢竟是一种絕对的歪曲。

經過从封建制度崩潰以来欧洲所發生的多次資產階級革命，这个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就逐漸發展、完备和巩固起来。必須指出，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多半是通过这个机关的，因为这个机关給农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等的上層分子以比較舒适、安靜和显要的职位，使他們駕于人民之上。我們看一看俄国在 1917 年 2 月 27 日以后这半年中發生的一些事情吧：以前黑帮分子把持的官吏位置，現在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贓物了。实际上他們不想进行任何認真的改革，力圖把这些改革拖延到“立宪會議召开的时候”，而召开立宪會議的日期，他們又慢吞吞地想拖延到战争結束以后！至于瓜分贓物，攫取部长、次长、总督等肥缺，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會議！分配政府要职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分“贓物”的一种表现。現在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經分配完了，分配方面的“錯誤”也由几次重新分配糾正了，——这無疑是 1917 年 2 月 27 日到 8 月 27 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觀的总结。

但是在各資產階級政党和小資產階級政党之間（拿俄国来講，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之間）“重分”官吏机关

的事实愈多，各被压迫阶级，首先是领导它们的无产阶级，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也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关，也就是巩固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这个任务的提出，不是由于逻辑的推论，而是由于实际的事变发展，由于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经验的。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的提到日程上来。1852年，根据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精确的观察，只能断定无产阶级革命已接近于提出“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这三年法国历史更为广泛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三版序言里写道：……

“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历史上每一次阶级斗争的结局，都比其他各国更加彻底。它的经常更换的政治形式最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进展及其结果。法国在中世纪时代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在文艺复兴以后是一个纯粹等级制的典型帝国，它在大革命时代摧毁了封建制度而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

治，它所具有的这种典型的鮮明性，是欧洲其他国家所沒有的。抬起头来的無产階級反对統治的資產階級的斗争在这里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国从来沒有的。”（1907 年版第 4 頁）

最后一句話已經过时了，从 1871 年起，法国無产階級的革命斗争就停頓了，可是無論停頓多久，法国也还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無产階級革命中成为坚决把階級斗争进行到底的典型国家。

現在我們来概括地看一看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們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在更加广闊的場所更緩慢更多样地进行着：一方面，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和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各国）里正在形成“議會权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职位“贓物”的各資產階級政党和小資產階級政党，在不改变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础上为爭奪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及其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無疑問，这是現代資本主义国家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在 1848—1851 这三年內，法国迅速地、尖銳地、集中地表明了整个資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那种發展过程。

特別是帝国主义时代，銀行資本时代，大資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資本主义轉变为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时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無产階級加强鎮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

現在，整个世界历史無疑将在比 1852 年更加广泛的範圍內把無产階級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摧毀”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对这一点提供了極有用的材料。

### 3. 1852 年馬克思对問題的提法<sup>①</sup>

1907 年梅林把 1852 年 3 月 5 日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摘要登載在“新时代”杂志<sup>11</sup>（第 25 卷第 2 期第 164 頁）上。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出色的論述：

“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会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階級斗争的历史發展，资产阶级的經濟学家也已对各个階級做过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証明了下列几点：（1）階級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發展的一定历史阶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联系；（2）階級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階級和进入無階級社会的过渡”……<sup>12</sup>

在这一段話里，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两点：第一、他的學說同資產階級最淵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學說之間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區別；第二、他的国家學說的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內容是階級斗争。人們时常这样說，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階級斗争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来，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

① 第 2 版增加的一节。

的。誰要是仅仅承認階級斗争，那他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的圈子。用階級斗争学說来限制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变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認階級斗争、同时也承認無產階級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須用这块試金石来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义。無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际上向工人階級提出这个問題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馬克思主义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考茨基写的“無產階級专政”一書，是在1918年8月，即在本書第一版刊行以后很久才出版的，這本書是用市僧的观点歪曲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叛馬克思主义的典型（見我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过去的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現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馬克思所評述的資產階級立場，因为这个机会主义把承認階級斗争的范围局限于資產階級关系的領域以內。（在这个領域、这个範圍內，任何一个有知識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斗争！）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的問題上不承認有階級斗争，即不承認在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資產階級并徹底消灭資產階級的时期有階級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階級斗争空前残酷、階級斗争形式空前尖銳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必须是新型的民主国家（对無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专政国家（对資產階級是专政的）。

其次，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第三章

##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 1. 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像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写了一些鼓舞工人农民进行斗争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以自由主义的论调大叫其“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因为公社社员表现了如他所说的“翻天覆地”的英雄主义而感到愉快。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

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义的历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产階級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綱領和議論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驟。分析这个經驗，从这个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据这个經驗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論，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任务。

馬克思認為对“共产党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員的革命經驗而做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1872年6月24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产党宣言”的綱領“現在有一些地方已經过时了”。

他們又說……“特別是巴黎公社已經証明：‘工人階級不能简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話，是两位作者从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書中借用来的。

总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宣言”再版时，他們就把这一点加进去作为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这个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讀者，大概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了解这个修改的意义的。我們在下面专論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詳細說明。現在只須指出，对于我們前面引証的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流行着一种庸俗的“了解”，認為馬克思在这里是強調緩慢發展的思想，不主張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应当打碎和

摧毁“現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正是建立起巴黎公社的时候，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试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着重号是馬克思加的，原文是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尝试正是这样”（見“新时代”杂志第20卷1901—1902年第1期第709頁）<sup>14</sup>。（馬克思的“給庫格曼的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校訂和作序的。Θ）

“摧毁官僚軍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經把馬克思主义关于無产階級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問題的主要教訓，简单地表明了。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在“解釋”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仅把这个教訓忘記了，而且还公然歪曲它！

馬克思从“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中摘录的話，我們在前面已經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証的馬克思的那段論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結論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純粹資本主义国家的典型，还没有軍閥制度，大体上也没有官僚制度。所以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英国革命，甚至人民革命，很有可能不必以破坏“現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

Θ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卷第96—105頁。——編者注

現在到了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說法已經不适用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从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來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一般欧洲式的、支配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軍事机关的汚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国或美国，打碎、摧毁“現成的”（1914—1917年間，这两个国家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馬克思說破坏官僚軍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見解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这些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的司徒卢威的信徒，也許会說馬克思說這句話是“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义曲解为非常貧乏的自由主义，在他們看来，除了資产階級革命和無产階級革命的对立以外，再沒有任何东西，而且他們对这种对立的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紀的革命为例，那末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應該算是資产階級革命。但是無論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两次革命中显然都沒有積極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恰恰相反，1905—1907年的俄国資产階級革命，虽然沒有取得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輝煌”成績，但这無疑是一次“真正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剝削的社会最“底層”，都站起来了，提出自己的要求，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設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他們影响了整

个革命的进程。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的革命，才真正是人民多数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制就不能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完成。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人民的革命”时，丝毫也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他极严格地估计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消灭“寄生虫”、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它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更正确些说，只是指出这个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的方法。“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究竟会采取怎样的具体形式，怎

样才能組織得同最完备最徹底的“民主”相适应，关于这个问题，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經驗来解答。

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書中曾对公社的經驗（尽管經驗很少）作过極仔細的分析。現在我們把該書中最重要的几段摘录下来：

中世紀产生的“集中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軍、警察、官僚、僧侶、法官等級”，在19世紀已經發展起来了。随着劳資間階級对抗的發展，“国家政权就愈来愈变成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变成階級統治的机器。在每次标志着階級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純粹压迫性質，也就日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全国資本对劳动作战的武器”。第二帝国使这种情况巩固起来。

“公社是同帝国絕對相反的东西”。“它是共和国的一种形式，这种共和国不仅应该消灭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階級統治本身”……

無产階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形式是怎样的呢？公社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軍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現在一切自命为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綱領中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們的綱領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实际上他們恰巧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經拒絕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这



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并变为公社中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管理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等旧政府物质权力的武器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僧侣……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公开选出，对选民负责，并且随时可以撤换”……<sup>15</sup>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备的民主制：取消常备军，对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完全用一些原则上不同的机关来代替另一些机关。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实际例子：民主制达到了一般想像的最充分最彻底的程度以后，就会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会由国家（=镇压一定阶级的特别力量）变为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是居民中的大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人民大多数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的特殊机关来直接进行

这些工作，而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从压迫者的民主制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制，从国家这个镇压一定阶级的“特别力量”转变为由人民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便“忘记了”原始基督教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幼稚行为”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主义的要求。最新的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曾不止一次地玩弄过资产阶级嘲笑“原始的”民主主义的庸俗把戏。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及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主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主义”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的原始民主主义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就变得很简单，只要简单地办理一些登记、填表、检

查等手續就行了，因此，每一个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須付給普通“工人的工資”，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享受特权的“长官制”的残余鏟除干淨。

对一切公职人員毫無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低到普通“工人工資”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必然会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結合起来，同时也必然会成为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国家的純政治的社会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剝夺剝夺者”的措施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資料資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公有制的措施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

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項最大的开支，即軍隊和官吏。”

农民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样，他們当中只有極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头”（从資產階級的意义來說），即变成富人，变成資產者，变成生活上有保障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資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資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絕大多數农民是受政府压迫的，是渴望推翻这个政府和渴望“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無产階級，而無产階級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 3. 議會制的消灭

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議會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ver-und zertreten）人民，普選制應當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使他們能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正如個人選擇的權利為了同一目的服務於任何一個工廠主一樣。”

由於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占了統治地位，這個在1871年對議會制提出的卓越批評，現在也成為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的言論”了。以部長和議員為職業的人們，現今的無產階級叛徒和“實際的”社會主義者，把批評議會制的事情完全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做，而根據這一理由又振振有詞地宣布，對議會制的任何批評都是“無政府主義”！難怪“先進的”議會制國家的無產階級一看到謝德曼、大衛、列金、桑巴、列諾得爾、韓德遜、王德威爾得、斯陶寧格、布蘭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會主義者”，就產生一種惡感，而日益同情無政府工團主義，儘管無政府工團主義是機會主義的親兄弟。

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像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樣，把革命的辯證法看做是一種時髦的空談或動听的詞藻。馬克思善於無情地摺棄無政府主義，因為它不會利用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畜圈”，特別是在顯然不具備革命形勢的時候，但同時馬克思又善於給議會制一種真正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內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提出國家問題，如果把議會看做一個國家機關，那麼就無產階級在這方面的任務來說，擺脫議會制的出路何在呢？

怎样才能避免議會制呢？

我們不得不再指出，馬克思从研究公社中得出的教訓竟被現代的“社会民主党人”（請讀作現代的社会主义叛徒）忘掉了，他們只知道对議會制的無政府主义批評或反動批評，簡直不懂得任何其他的批評。

摆脱議會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关和废除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关由清談館变为“工作”机关。“公社不应当是議會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不应当是議會式的，而应当是工作”机关，这正好打中了現代社会民主党議會議員和議會“哈巴狗”們的要害！請看一看任何一个議會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議會为了愚弄“老百姓”，專門从事空談。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国这样的共和国，在这个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国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議會以前，議會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經显露出来了。腐朽的市儈英雄們，如斯柯別列夫和策烈鐵里之流，切尔諾夫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竟按最卑鄙的資產階級議會主义方式来玷污苏維埃，把它变成了清談館。在苏維埃里，“社会主义的”部长先生們用空談和決議来愚弄輕信的农民。在政府里，則不断更換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讓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尝尝高官厚祿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轉移”人民的“視線”。而“国家”工作却在官厅和司令部里“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業报”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業的“好社会”中的人物的坦率口吻自供說，甚至在“社会主义者”（請原諒我用这个名詞！）管的各

部中，全體官吏實際上原封未動，他們像從前一樣行使着職權，十分“自由地”對革命的創舉實行怠工！即使沒有這個自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政府的事實不也証明了這一點嗎？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呆在政府官場里的切爾諾夫、魯薩諾夫、晉集諾夫之流以及“人民事業報”的其他編輯先生，竟毫不害羞地、滿不在乎地當眾宣布說，在“他們的”各部中一切照舊！！革命民主的詞句是用來愚弄鄉下人的，官僚主義官廳的拖拉作風則是為了博得資本家的“歡心”，這就是“真誠的”聯合政府的實質。

在公社用來代替資產階級社會貪污腐敗的議會制的機關中，發表意見和討論的自由不會流為騙局，因為議員必須親自工作，親自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檢查在實際生活中執行的結果，親自對選民負責。代表機關仍然存在，然而作為一種特殊的機構，作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議員們享有特權的議會制，在這裡是不存在的。如果沒有代表機關，那我們就很難想像有什麼民主制，也很難想像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但是，如果我們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不是空談，如果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願望是我們真正的和真誠的願望，而不是像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謝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爾得之流的那種騙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詞句，那我們可以而且應當不要議會制。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談到既為公社需要、又為無產階級民主制需要的那種官吏機構的職能時，他拿“任何一個工廠主”雇用的人員來加以比較，即拿雇用“工人、監工和會計”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來加以比較。

馬克思絲毫沒有陷入空想主義，他沒有虛構和幻想“新”社會。相反，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過渡形式，

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吸取無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經驗，竭力从这个經驗中取得实际教訓。他向公社“学习”，正像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經驗学习一样，他对这个运动从来没有講过一句学究式的“訓言”（像普列汉諾夫所說的“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或策烈铁里所說的“阶级应当自己約束自己”）。

立刻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談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立刻打碎旧的官吏机器，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經驗，这是革命無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資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簡化了，使我們有可能抛弃“长官制”，把全部事情交給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會計”的無产者（統治阶级）組織。

我們不是空想主义者，我們决不“梦想”立刻取消任何管理制度和任何从屬关系；这种由于不了解無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無政府主义梦想，是与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梦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們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們不是这样，我們希望由現在的人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現在的人們沒有从屬关系、沒有監督、沒有“监工和會計”是不行的。

但是应当服从的是一切被剝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鋒队——無产阶级。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制”可以并且應該在一天之內用“监工和會計”的簡單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現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發給“工人的工資”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們工人将以資本主义創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經驗

来亲自組織大生产，建立依靠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来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紀律，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們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們成为对选民負責的、随时可以撤換的而且是領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會計”（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們無产阶级的任务，無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應該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这个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个秩序下，日益簡化的监督和报告的职能将由大家輪流行使，等到大家逐渐習慣了遵守秩序，这些职能也就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19世紀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認為郵政是社会主义經濟的范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郵政是按国家資本主义壟断組織形式組織的一种經濟。帝国主义逐漸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类型的組織。現在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飢挨餓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也正是这个資產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社会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經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資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鉄拳粉碎这些剝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們就会有一个排除了“寄生虫”而拥有高度技术设备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經團結起来的工人亲自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會計，付給所有这些人的工資，也像付給所有“国家”官員的工資一样，将相当于工人的工資。这就是对一切托拉斯的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这样做会使劳动者免除剝削，并估計到了公社在实践中創造的經驗（特別是在国家建設方面的經驗）。

把整个国民經濟組織得像郵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會計以及所有公職人員所領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資”，使他們受武



裝無产階級的監督和領導，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标。我們所需要的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這樣才能消滅議會制而保留代表機關，這樣勞動階級才能使這些機關不受資產階級的糟蹋。

#### 4. 民族統一的建立

……“公社在它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十分肯定地說，公社甚至應該……成為一個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國民代表機關”也應當由各公社選舉出來。

……“那時仍由中央政府行使的一些為數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職能不應該廢除（斷言應該廢除是有意的捏造），而應該交給公社的官吏，即交給那些真正負責的官吏”……

……“民族的統一不應該消滅，相反地應該借助於公社的機構建立起來。要實現民族的統一，必須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這個國家政權只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疣”……“任務就在於鏟除舊政權的純粹壓迫機關，把這個妄圖駕於社會之上的政權的合理職能奪過來，交給社會上負責的公僕”。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务”一書，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是多麼不了解，或者更正確些說，是多麼不願意了解馬克思的這些論述。伯恩施坦在談到馬克思上述的一段話時寫道，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來說，在一切要點上都十分類似蒲魯東主張的聯邦制…… 不管馬克思和‘小資產者’蒲魯東（伯恩施坦把‘小

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大概是表示讽刺)之間有种种分歧,可是在这些要点上,他們的思維过程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說:自然,市政局的作用更加重要了,但是,“我怀疑民主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废除(Auflösung——直譯是解散、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組織,像馬克思和蒲魯东所想像的那样;由各省或各州的會議选出代表組織全国會議,而各省或各州的會議則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組成,这样,全国代表机关的旧形式就会完全消失”(伯恩施坦,“先决条件”1899年德文版第134頁和136頁)。

把馬克思关于“消灭寄生虫式的国家政权”的觀點同蒲魯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談,这簡直是駭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馬克思在这里談的根本不是要建立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一切资产阶級国家里旧的资产阶級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庸俗的市僧人物中和停滞的“改良主义”环境中看到的东西,只是看到了“市政局”!至于無产阶級革命,机会主义者連想都没有想过。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沒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爭論。許多人都曾駁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諾夫和西欧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談到伯恩施坦对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不会用革命的头脑来思考革命,他們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馬克思头上,把他同無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魯东混为一談。而想成为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想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諾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

和机会主义者如此庸俗地認識馬克思主义同無政府主义的区別的来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們以后还要講到。

在上述的馬克思关于公社經驗的論述中根本沒有談到联邦制。馬克思和蒲魯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馬克思和蒲魯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認為相同的。

馬克思和蒲魯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們两人都主張“打碎”現代国家机器。馬克思主义同無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魯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無論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派都不願意看見，因为他們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馬克思主义。

馬克思同蒲魯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問題上（更不用說無产階級专政的問題了）。联邦制在原則上是从無政府主义的小資产階級观点产生的。馬克思是主張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那段論述中，絲毫也沒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会把消灭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無产階級和貧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組織在公社內，采取一致行动打击資本，粉碎資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給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嗎？难道这不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無产階級的集中制嗎？

伯恩施坦根本沒有想到可能有自願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願結合为統一的民族；可能使無产階級的公社在破坏資产階級統治和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事業中自願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軍

國强迫实行和維持的东西。

馬克思似乎預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故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取消民族的統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有意的捏造。他故意用“建立民族統一”这句话，以便把自觉的、民主的、無产阶级的集中制同资产阶级的、軍閥的、官吏的集中制对立起来。

但是……不願意听的人比聋子还要聋。現代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者正是不願意听消灭国家政权、鏟除寄生虫这样的話的人。

### 5. 消灭寄生虫式的国家

我們已經引用了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論，現在再引几段。

馬克思写道：……“人們往往把新的历史創举当作是抄袭旧的、甚至已經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只要新的机关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这就是新的历史創举的通常命运。于是摧毁（bricht——打碎）現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看作中世紀公社的复活……看作許多小国家的联盟（孟德斯鳩，吉倫特派）……看作从前反对过分集中的斗争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迄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疣——‘国家’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給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証他們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自身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来对抗現在已經成为废物的国家政权的東西

了”……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疣”，“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经或为废物”，——马克思在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关于国家就是这样谈的。

所有这些都是在大約半世紀以前写的，現在必須把这些話發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認識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馬克思观察了他經歷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做出的結論，恰巧在新的無产階級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遺忘了。

……“人們对公社的各种估計以及公社所代表的利益証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权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压迫者的政权。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产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争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沒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騙局”……

空想主义者从事于“發現”可以使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無政府主义者避而不談一般政治形式的問題。現代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者則認為，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形式是不可逾越的極限，他們对着这个“典范”磕头磕得头破血流，他們宣布摧毁这种政治形式的任何意圖都是無政府主义。

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結論：国家一定会消逝；国家消逝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無产階級”。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去發現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确切地考察和分析了法国历史，正确

地得出了 1851 年事變的結論：問題在於被壞資產階級的国家機器。

當無產階級群眾革命運動爆發的時候，儘管這個運動遭到挫折，儘管這個運動為期很短而且有著顯著的弱點，馬克思還是來研究這個運動究竟發現了怎樣的政體形式。

公社是由無產階級革命“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者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国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是“終於發現的”政體形式，這個政體形式可以而且應該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機器。

我們往下就會看到，俄國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在另一個環境和另一種條件下繼續著公社的事業，証實著馬克思這種天才的歷史分析。

## 第四章

### 續前 恩格斯的補充說明

馬克思對公社經驗的意義問題指出了基本的要點。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談到這個問題，說明馬克思的分析和結論，並且非常有力地非常突出地闡明這個問題的其他方面，因此我們必須特別來談談這些說明。

#### 1. “住宅問題”

恩格斯在他論住宅問題的著作（1872 年出版）中，已經估計到

了公社的經驗，并且屢次談到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談到这个具体問題时，一方面明显地說明了無产階級国家同現代国家相似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我們可以把前者和后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他又說明了二者之間不同的特征，即無产階級国家是要逐漸消亡的。

“怎样解决住宅問題呢？在現在的社会里，解决这个問題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問題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問題还会不断产生，也就是說，等于沒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問題呢？这不仅要以時間地点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带根本性的問題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預备憑空設想未来社会結構的制度，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費時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能够使真正需要住宅的人立刻得到帮助。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剝夺現在的房东，讓沒有房子住或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無产階級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像現代国家剝夺其他东西的措施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1887年德文版第22頁）<sup>16</sup>

这里沒有談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是談到了国家政权活动的內容。根据現代国家的命令也是要剝夺住宅和占据住宅的。無产階級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講，也会“下令”占据和剝夺住宅。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关，即与資產階級勾結的官吏机构，是完全不能执行無产階級国家的命令的。

……“必須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

部工業，是同蒲魯東主義的‘贖買’政策完全相反的。如果採用後一種措施，則每個工人將成為某一所住宅、某一塊土地、某些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如果採用前一種措施，則‘勞動人民’將成為全部住宅、工廠和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者。這些住宅、工廠等等，至少在過渡時期還未必會毫無代價地分配給個人或共耕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不是消滅地租，而是用另一種形式把地租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一切勞動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排斥承租和出租。”（第 68 頁）<sup>①</sup>

我們在下章將要考察在這段論述中提到的問題，即關於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的問題。恩格斯非常謹慎，他說無產階級國家“至少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分配住宅。把屬於全民的住宅租給個別家庭就要征收租金，要實行一定的監督並規定分配住宅的某種標準。這一切都要求有一定的國家形式，但決不需要特別的軍事官僚機關及其享有特權的長官。至於過渡到免費分配住宅，那是與國家的完全“消亡”聯繫着的。

恩格斯談到布朗基主義者在公社以後因受到公社經驗的影響而轉到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上的時候，曾順便把這個立場表述如下：

……“無產階級必須採取政治行動、實行專政，是為了過渡到廢除階級並廢除國家”……（第 55 頁）<sup>②</sup>

那些喜歡咬文嚼字的批評家或者“糟蹋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大概以為，在這裡承認“廢除國家”，在上述“反杜林論”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605 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 589 頁。——譯者注



一段論述中又把這個公式當作無政府主義的公式加以否定，這是矛盾的。如果機會主義者把恩格斯算作“無政府主義者”，那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社會沙文主義者斥責國際主義者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做法現在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了。

國家會隨着階級的廢除而廢除，這是馬克思經常教導我們的。“反杜林論”的那段人所共知的關於“國家消亡”的論述，並不是單純斥責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除國家，而是斥責他們宣傳可以“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

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把馬克思主義在消滅國家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們來回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是特別有益的。

## 2. 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這次論戰發生在187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把駁斥蒲魯東主義者、“自治派”或“反權威主義者”的論文寄到意大利，收在一本社會主義文集里，這些論文在1913年才譯成德文發表在“新時代”雜誌上<sup>17</sup>。

馬克思譏笑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時寫道，……“如果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採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犯了侮辱原則的莫大罪行，因為工人為了滿足自己低微的起碼的日常需要，為了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廢除國家，而賦予國家以革命的暫时的形式”……（“新時代”雜誌1913—1914年第32卷第1期第40頁）

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只是反對這樣的“廢除”國家！

馬克思完全不是反對國家將隨階級的消逝而消逝，或國家將隨階級的廢除而廢除，而是反對要工人拒絕運用武器，拒絕運用有組織的暴力，即拒絕以“打破資產階級反抗”為目的的國家。

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家具有“革命的暫時的<sup>1</sup>形式”，以免人們歪曲他同無政府主義者鬥爭的真實意義。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暫時的。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都認為廢除國家是目的，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沒有分歧。但我們肯定地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運用國家政權的武器、工具、手段去反對剝削者，正如為了消滅階級，就必須實行被壓迫階級的暫時專政一樣。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把問題提得非常尖銳，非常明確：工人在推翻了資本家的壓迫以後，應當“放下武器”呢，還是應當利用它來反對資本家，粉碎他們的反抗？一個階級有步驟地運用武器反對另一個階級，如果不採用國家那種“暫時的<sup>2</sup>形式”，又採用什麼呢？

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都應該問問自己：他在同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嗎？第二國際絕大多數正式社會主義政黨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嗎？

恩格斯更加詳盡更加通俗地闡明了這個思想。他首先譏笑蒲魯東主義者的糊塗觀念，他們自命為“反權威主義者”，否認任何權威、任何服從、任何權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廠、鐵路、航海的輪船來說，這是一些使用機器的、很多人有計劃地共同工作的複雜技術企業，如果沒有某種從屬關係，沒有某種權威或權力，那就沒有一樣能夠開動起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恩格斯寫道，……“如果我拿這種論據來反對最頑固的反權威主義者，那他們只能這樣回答：‘是啊！這是對的，但這裡

說的并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的那種權威，而是說的某種委託。’這些人以為只要改變某一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一事物本身”……

恩格斯由此指明了權威和自治都是相對的概念，運用它們的範圍隨着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改變，把它們看作絕對的東西是荒謬的，並且補充說，使用機器和大規模生產的範圍在日益擴大，然後恩格斯從權威問題的一般論述談到國家問題。

恩格斯寫道：……“如果自治派僅僅是想說將來的社會組織只會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權威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一切使權威成為必要的事實，只是拚命反對名詞。

為什麼反權威主義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對政治權威和反對國家呢？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一致認為，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逝，也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成關心社會利益的簡單管理職能。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卻要求在那些產生政治國家的社會關係廢除以前，一舉把政治國家廢除。他們要求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廢除權威。

這些先生見過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炮、刺刀，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迫使另一部分人服從自己的意志。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不得不用自己的武器使反動派感到畏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沒有依靠武裝人民的權威來反對資產階級，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多嗎？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權

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們只是在散布糊塗觀念;或者是他們知道这一点,如果是这样,那他們就是背叛無产階級的事業。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們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頁)①

在这段論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政治与經濟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專門論述这个問題)时應該考察的問題。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簡單管理职能的問題和关于“政治国家”的問題。后面这个名詞特別容易引起誤会,它是指处在消亡過程中的国家,因为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才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段論述中最精彩的地方,又是他用来反駁無政府主义者的問題提法。願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無政府主义者爭論过几百万次,但他們在爭論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應該采取的。無政府主义者对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出問題的。無政府主义者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以及革命对暴力、权威、政权、国家的特殊任务。

現在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無政府主义者的批評,可以归结为純粹市儈式的極其庸俗的一句話:“我們承認国家,而無政府主义者不承認!”这样庸俗的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感到厭惡。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談問題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認国家的消逝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結果。然后他具体提出了关于革命的問題,这个問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人通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613—614頁。

——譯者注

常是避而不談的，他們把它留給無政府主义者来專門“研究”。恩格斯一提出這個問題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公社難道不應該更多地运用国家的革命政权，即运用武装起来并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無产階級的革命政权嗎？

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派，对于無产階級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問題，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俗的褻笑口吻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用詭辯来搪塞，說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無政府主义者有权攻击社会民主派，責备他們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無产階級革命的經驗，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無产階級对銀行和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办。

### 3. 給倍倍尔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給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話，这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問題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之一。附带說一下，据我們所知，倍倍尔第一次發表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2卷里，也就是說在恩格斯發出这封信的三十六年之后。

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馬克思在給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綱領草案，并且特別談到了国家問題，他写道：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廢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公社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無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馬克思

駁斥蒲魯東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以后，国家就会自行消散(sich auflöst)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暴力镇压敌人的一种暂时机关，那末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無稽之談。無产階級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到了有可能来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国家’一詞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極好的德文古詞，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德文原本第 321—322 頁)<sup>18</sup>

应当指出，在这封信里談到了党綱，几星期以后，馬克思在一封信(馬克思的信寫于 1875 年 5 月 5 日)里批判的党綱就是这个党綱；当时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住在倫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話里用“我們”二字，無疑是以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領袖建議，把“国家”一詞从党綱中去掉，用“公团”来代替。

如果向現在这些为迁就机会主义者而伪造的“馬克思主义”的首領們建議这样来修改党綱，那他們該会怎样大叫大罵“無政府主义”呵！

讓他們叫罵吧。資产階級会因此称贊他們的。

我們还是要做我們自己的事情。在审查我們的党綱时，絕對必須考虑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意見，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恢复馬克思主义，清除歪曲馬克思主义的一切言論，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維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意見。困难也許只是在名詞上。德文中有两个詞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詞不是指单独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沒有这样一个詞，也許只好采用法

文中的“公社”一詞，虽然这个詞也有它的不便之处。

“公社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論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論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經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鎮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剝削者）；它已經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經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鎮压的特別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末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关，因为国家机关将無事可做而逐渐失去其作用。

“無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詞挖苦我們”，——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攻击說的。恩格斯認為他攻击得对，因为“人民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两种說法都是荒謬的，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的。恩格斯力圖糾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無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的偏差，使这个斗争在原則上正确，清除它在“国家”問題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見。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擱置了三十六年。我們在下文可以看到，就在这封信發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頑固地重犯恩格斯警告过的那些錯誤。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給恩格斯，信中順便談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綱領草案的意見，并說他責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讓步态度（見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頁）。但是把倍倍尔的“我們的目的”（《Unsere Ziele》）这本小册子拿来，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国家的完全不正确的議論：

“必須把基于阶级統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們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頁）

這就是倍倍爾那本小冊子 第九版(第九版!)中的話。難怪德國社會民主黨還是如此頑固地重複着關於國家問題的機會主義議論，特別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釋被人埋藏起來而整個生活環境又長期使人“忘記”革命的時候。

#### 4. 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時，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 1891 年 6 月 29 日寄給考茨基而過了十年以後才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sup>19</sup> 批判，因為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社會民主黨在國家結構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的。

順便指出，恩格斯還對經濟問題作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指示，這說明恩格斯是如何細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種種變化，從而說明了他是如何善於在一定程度上預先想到當前帝國主義時代的任務。這個指示是恩格斯在談到該綱領草案用“無計劃”(Planlosigkeit) 這幾個字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特徵時作的，他寫道：

……“當股份公司演進到統治并壟斷許多工業部門的托拉斯的時候，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的現象也沒有了。”（見“新時代”雜誌第 20 卷 1901—1902 年第 1 冊第 8 頁）

這裡指出了對現代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理論評價中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變成了壟斷資本主義。後面這四個字必須加上着重號，因為目前最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根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來斷定，壟斷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為“國家社會主義”等等。完備的計劃性當然是托拉斯所從來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儘管托拉斯有一點計劃



性，尽管資本大王們預先考慮到了一国範圍內甚至国际範圍內的生產規模，尽管他們有計劃地調節生產，但是現在還是處在資本主義下，雖然是在它的新階段，但無疑還是資本主義。在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看來，這種資本主義之“接近”社會主義，只是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接近，已經不難實現，已經可以實現，已經不容延緩，而決不是證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和粉飾資本主義的言論。

現在我們回過來講國家問題。恩格斯在這裡作了三類特別寶貴的指示：第一類是关于共和國問題；第二類是关于民族問題和國家結構的聯繫；第三類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國，恩格斯把它作為批判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重點。如果我們還記得當時愛爾福特綱領在整个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具有怎樣的意義，它怎樣成了整个第二國際的模範綱領，那末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恩格斯在這裡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

恩格斯寫道：“草案提出的政治要求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草案中沒有說（着重號是恩格斯加的）本來應當說的东西。”

其次，恩格斯解釋道，德國的憲法實質上是 1850 年最反動的憲法的抄本；正如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德國議會只是“專制制度的遮羞布”；想規定各小國存在、日耳曼各小國結成聯盟的憲法的基础上把“一切勞動工具變為公共財產”，那“顯然是荒謬的”。

“談論這個問題是危險的”，——恩格斯補充說，因為他深知在德國不能在綱領中公開提出建立共和國的要求。但是，恩格斯並不因為這個理由很明顯，“大家”都滿意，就這樣算了。他接着說：“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是要被人推進的。現在大部分社會民主黨的刊物都在散布（einreissende）機會主

义，这就說明提出这个要求是多么必要。現在人們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令重新宣布有效，或回想起在这个法令的統治下發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想要党承認德国的現行法制能够和平地实现党的一切要求”……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是出于害怕非常法令重新宣布有效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說明，正是因为在德国沒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走“和平”道路的想法是十分荒謬的。但恩格斯非常謹慎，他沒有把問題說死了。他承認，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國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發展是“可以想像”的（仅仅是“想像”！），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說：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無上的权力，議會和其他一切代表机关都沒有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在沒有任何必要时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替它遮羞”……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閣”，党的絕大多数正式領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掩护者。

……“这种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他們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巨大事变和政治危机一旦發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問題掩盖起来。其結果只会使党在紧要关头突然陷于束手無策的地步，使党对具有决定意义的問題看法模糊、缺乏一致的見解，因为这些問題从来没有經過討論……

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时的成就而不顧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这种做法也許是出于‘真誠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終是机会主义，而且

‘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許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毫無疑义的是，我們党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实行統治。这种民主共和国甚至是适用于無产階級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点已經被法国大革命証明了”……

恩格斯在这里特別明确地重述了像紅綫一样貫穿在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無产階級专政的捷径。这样的共和国虽然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因而也絲毫沒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階級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和尖銳化，以致一有可能滿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时，这种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無产階級专政即在無产階級領導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來說，这也是馬克思主义中“被人遺忘的言論”，孟什維克党在俄国 1917 年革命的开头半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們也把这些話忘記了。

恩格斯在談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关的联邦共和国問題时写道：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現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国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魯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把它們溶化在德国的整体中）“在我看来，無产階級只能采用統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共和国一般說来現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这已經成了障碍。如果在英国建立联邦共和国，那就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英国两个海島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虽然議會是統一的，但是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了障碍，那里所以还能容忍联

邦共和制，那只是因为瑞士甘願充当歐洲國家體系中純粹消極的一員。如果德國實行瑞士式的聯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聯盟制國家和完全統一的國家有兩點區別，首先一點是每個加盟國都有它特別的民事法規和刑事法規，都有它特別的法院組織；其次，每個加盟國都有與國民議院同時並存的由各加盟國代表組成的議院，在這個議院中，每一個邦不論大小都以一個邦的資格參加表決。”在德國，聯盟制國家是轉到完全統一的國家的過渡，所以不是要使 1866 年和 1870 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倒退，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運動”來加以補充。

恩格斯對國家的形式問題不但不抱冷淡態度，相反，却非常細致地去分析那些過渡形式，以便根據各個不同場合的具體歷史特點來估計某一個過渡形式是從什麼到什麼的過渡。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從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观点出發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他認為聯邦共和國是一種例外，是發展的障礙，是由君主國向集中制共和國的過渡，也是在一定的特殊條件下的“進步”。在這些特殊條件下，民族問題就提出來了。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雖然無情地批判了小國的反動性和在一定的具體情況下用民族問題來掩蓋這種反動性的現象，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絲毫沒有忽視民族問題的傾向，而荷蘭和波蘭兩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自己的”小國的狹隘市儈民族主義的極正當的鬥爭中，却常常表現出有這種傾向。

無論從地理條件、從共同的語言或從數百年的歷史來看，英國似乎已經把各個小地區的民族問題都“解決了”。可是，甚至在這

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問題还存在，因此他承認建立联邦共和国是一个“进步”。自然，这里他絲毫沒有放弃批評联邦共和国的缺点，絲毫沒有放弃为实现統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

恩格斯絕對不像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包括無政府主义者在内的  
小資產階級思想家那样，从官僚主义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絲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和省自願坚持国家的統一，这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主义和任何“命令主义”。

恩格斯在發揮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問題的綱領性观点时  
写道，……“总之，需要統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現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因为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 1798 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国並沒有什么不同。从 1792 年到 1798 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公社 (Gemeinde) 都有美国式的充分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們所應該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經由美国 and 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向我們表明，而現在又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英屬殖民地向我們証明了。这种省的和公社的自治制比瑞士的联邦制要自由得多，在瑞士，每个邦对整个联邦国家固然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县和公社也具有独立性。由邦政府任命县长 (Staatthalter) 和其他地方长官，这在講英語的国家里是絕對沒有的，我們将来在自己國內也必須坚决消除这种現象，取消普魯士式的 Landrat 和 Regierungsrat” (專員、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議把党綱关于自治問題的条文表述如下：“各省”(省或区域)“各县

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在被克倫斯基和其他“社会主义”部长的政府封閉的“真理报”(1917年5月28日第68号)<sup>①</sup>上，我已經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假革命、假民主、假社会主义的代表們是如何惊人地离开了民主主义。自然，这些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組成“联合政府”而把自己束縛起来的人对这些指示是充耳不聞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恩格斯根据确鑿的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駁斥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間非常流行的偏見，即認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1792—1798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見。民主集中制共和国賦予的自由实际上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換句話說，在历史上，地方、省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对于这个事实，以及所有一般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地方自治的問題，無論过去和現在，在我們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中都沒有充分注意。

### 5. 1891年为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所写的序言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內战”第3版写的序言中（写于1891年3月18日，最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順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問題提出了許多值得注意的意見以外，还对巴黎公社的教

<sup>①</sup> 見“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98—501頁。——譯者注

訓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sup>20</sup>。这个总结把公社以来二十年的全部經驗也包括进去了，并且是专门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国家迷信”观念的，因而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进行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对每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經驗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这一点正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时候，这个“孟什维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烈铁里很荣幸（卡芬雅克式的荣幸）有机会来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他在6月11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堡工人武装的决定，当然，他把这个决定说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并且说这一般是“国家”所需要的。

策烈铁里在6月11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论述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证明策烈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恩格斯顺便提出的另外一个有关国家问题的意见是关于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腐化而愈益机会主义化，因而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愈来愈加以庸俗的曲解，他们认为宗教问题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私人的事情！这种完全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綱領的立場正是恩格斯当时出来反对

的，但恩格斯在 1891 年還只看到自己黨內機會主義的最小萌芽，因此他說得很謹慎：

“參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代表，所以它的決議顯然是純粹無產階級性質的。有些決議把共和派資產階級由於卑鄙的懦怯而拒絕的、然而工人階級自由活動所必需的那些改革法定下來，例如實行宗教對國家來說僅僅是私人的事情的原則。有些決議則直接與工人階級的利益有關，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刺入了舊社會制度的內臟”……

恩格斯故意把“對國家來說”這幾個字加上着重號，目的是要指出德國機會主義的要害，因為德國機會主義宣布宗教對黨來說就是私人的事情，這樣也就把革命無產階級政黨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的”市儈的水平，市儈承認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拒絕執行黨對麻醉人民的宗教鴉片進行鬥爭的任務。

將來研究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史的历史學家在探討該黨 1914 年遭到可恥的破產的根源時，會找到關於這個問題的許多有趣的材料：從該黨思想領袖考茨基的論文中為機會主義打開大門的曖昧言論起，直到黨對 1913 年的《Los-von-Kirche-Bewegung》（與教會分離的運動）的態度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後二十年是怎樣為鬥爭的無產階級總結公社教訓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認為最重要的教訓：

……“正是軍隊、政治警察、官僚等舊的集權政府的壓迫權力，這種由拿破崙在 1798 年建立、以後一直被每屆新政府當作有用的工具接收並利用來反對自己的敵人的權力，應該在全國各地復沒，正如它在巴黎復沒一樣。



公社一开始就应当承認，获得統治权的工人階級不能繼續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階級为了不致失去刚刚爭得的統治权，它一方面应当鏟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保證自己有反对自己的代表和官吏的权利，宣布他們每个人都毫無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換”……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說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員，“社会公僕”，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

……“为了不讓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僕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給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同时用法律規定选举者随时可以撤換被选举者。第二、不分职位高低，所有公职人員的工資同其他工人的工資相等。公社一般給的最高薪金为6 000 法郎<sup>①</sup>。这样就可靠地防止了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何况公社还規定各代表机关的代表必須絕對服从选民的委托”……

恩格斯在这里談到了一个有趣的界綫，一达到这个界綫，徹底的民主制就变为社会主义，同时它也就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服务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簡單的監督和統計手續，使絕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

● ① 名义上約等于2 400 卢布，但按現在的匯率計算，約等于6 000 卢布。有些布尔什維克提議例如在市杜馬內給9 000 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議全国以6 000 卢布（这个数目是足够的）为最高薪金，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饒恕的。

胜任。要完全消除升官發財的思想，就必須使國家服務機關中那些收入不多但是“光榮的”位置不能成為在銀行和股份公司內找到肥缺的橋梁，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所經常看到的那樣。

但是，恩格斯沒有犯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所犯的那種錯誤：他們說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則是多餘的。這種似乎很明智但實際上並不正確的論調，對於任何一種民主設施，連給官吏發微薄的薪金的辦法也包括在內，都可以這樣說，因為在資本主義下徹底的民主制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則任何民主制都是會消亡的。

這是一種詭辯，正像古時候有句笑話：一個人掉了一根頭髮，他是否就成了禿頭呢？

徹底發展民主制，找出發展的形式，用實踐來檢驗這些形式等等，都是為社會革命進行鬥爭的任務之一。任何單獨存在的民主制都不會產生社會主義，但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永遠不會是“單獨存在”，而總是“相互依存”的，它影響經濟，推動經濟的改造，受經濟發展的影響等等。這是活生生的歷史的辯證法。

恩格斯繼續寫道：

……“這種炸毀(Sprengung)舊的國家政權并用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的情形，已經在‘法蘭西內戰’第三章中作了詳細的描述。但是在這裡還有必要再來簡單地談一談這種代替的幾個特點，因為正是在德國，對國家的迷信已經從哲學方面轉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了。按照哲學家的學說，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譯成哲學語言，就

是上帝在人間的統治，也就是永恒真理和正义所由实现或应当实现的場所。由此就产生了崇拜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心理，这种心理之所以容易生根，是因为人們从小就一直認為全社会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極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人們以为，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主张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勇敢地前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無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無产阶级在爭取阶级統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無产阶级也将同巴黎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坏的一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的这一堆垃圾完全抛掉为止。”

恩格斯曾經警告过德国人，叫他們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記一般国家問題的社会主义原則。他的警告現在看起来好像是直接对策烈铁里和切尔諾夫之流先生們的教訓。因為他們在“联合政府”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迷信和崇拜。

还应当指出两点：（1）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說，压迫的形式对于無产阶级是無所謂的，像某些無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樣。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阶级斗争形式和阶级压迫形式，能够大大地促进無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2）为什么只有新一代才能够完全抛掉国家制度这一堆垃圾呢？这个問題是同民主制的消除問題联系着的，現在我們就来

談談這個問題。

## 6. 恩格斯論民主制的消除

恩格斯在談到“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连带說到这一点。

恩格斯在70年代主要是論述“国际”問題的文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sup>①</sup>）的自序（写于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中写道，在所有的論文里，他都用“共产主义者”这个名詞，而不用“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魯东派和德国的拉薩尔派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在当时，馬克思和我两人都觉得，为了特別表明我們的观点，絕對不能用这样一个有伸縮性的名詞。現在情况不同了，这个名詞（“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許还可以过得去（mag passieren），虽然它对我們这样的党來說仍然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因为我們党的經濟綱領不单单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还是共产主义的，党的最終政治目的是完全消除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制。然而真正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政党的名称永远不会完全名副其实；党在發展，而名称却没有变。”<sup>21</sup>

辯証法家恩格斯到臨終时仍然忠于辯証法。他說：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即群众性的無产階級政党。現在（19世紀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

① “‘人民国家’杂志上关于国际問題的論文”。——編者注

以过得去”，只要党在發展，只要它意識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确切的，不讓这个名称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發展！

也許某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話来安慰我們布尔什維克說，我們有真正的政党，它很好地在發展；就連“布尔什維克”这样一个毫無意义的奇怪的名称，除了表示我們在1903年布魯塞爾—倫敦代表大会上占多数这个完全偶然的事实外并沒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称，也还“可以过得去”……現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市僧民主派在7—8月間对我党实行迫害，“布尔什維克”这个名詞获得了全民的荣誉，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真正的发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許連我自己也对我在4月間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議表示怀疑了。也許我要向同志們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們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維克这个名詞放在括弧內……

但是党的名称問題远不及革命無产階級对国家的态度問題重要。

人們通常在談論国家問題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們在上面也順便提到的那个錯誤。这就是：老是忘記國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制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制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論断似乎是極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許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們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制也就是承認这个原則。

不是的。民主制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制就是承認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階級对另一个階級、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強力的組織。

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組織有系統

的强力，消灭任何加在人們头上的强力。我們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的社会制度。但是，我們向往社会主义，我們也深信社会主义将發展为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就沒有任何必要对人們使用强力，沒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們将習慣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強力和服从。

为了強調这个習慣的因素，恩格斯也說到了“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堆垃圾完全抛掉”的新的一代，这里所謂国家制度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

为了說明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問題。

## 第五章

### 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

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即 1875 年 5 月 5 日給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 1891 年才在“新时代”杂志第 9 卷第 1 册上發表，有俄文单行本）对这个問題作了最詳尽的說明。在这篇輝煌的著作中，批判拉薩尔主义的論战部分可以說是遮盖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对共产主义發展和国家消亡之間的联系的分析。

#### 1. 馬克思对这个問題的提法

如果把馬克思在 1875 年 5 月 5 日給白拉克的信同上述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28 日給倍倍尔的信比較一下，从表面上看也許会

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更浓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劝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还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要有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至于确定将来“消亡”的日期，这当然无从谈起，但很明显，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所以有表面上的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目的不同。恩格斯的目的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扼要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完全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问题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时候，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

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自然科学家

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对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一切文明国家里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仅仅因为每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而在形态上多少有些不同，在发展程度上也多少有些不同。‘现代国家’却是各不相同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瑞士完全不同，英国同美国也完全不同。所以，‘现代国家’只是一种虚构的概念。

但是，不管国家的形式如何纷繁，各个不同的文明国家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有发展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同现在国家的根基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的未来相对来说，也可以说‘现代国家’。

其次，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会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解答；否则，即使你千百次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sup>22</sup>

马克思这样讽刺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提出了问题，并且好像是警告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切证明了的科学材料。

十分确切地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证明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遗忘、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



会主义者所遗忘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

##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馬克思繼續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無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就是馬克思根据他对無产阶级在現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分析，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無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調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結論。

从前，問題的提法是这样的：無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問題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無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們知道，“共产党宣言”就是把“無产阶级变为統治阶级”和“爭得民主”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制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怎样变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順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較完备的民主制就是民主共和国。但是这种民主制始終只限于资本主义剝削的狭小范围，因此它实质上始終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終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

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无暇过問民主”，“无暇过問政治”，以致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說是証实这一論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一段很长的時間，几乎有半世紀之久（1871—1914年），宪法一直承認結社是合法的，在这个时期內，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做的工作要比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得多，特别是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了举世未有的高度。

那末这种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万雇佣工人中只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500万雇佣工人中只有300万是工会会员！

供極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如果仔細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結構，那末無論在选举法的“細微的”（似乎是細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議机关的办事手續上，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的集会場所不准“穷人”使用！），在純粹按资本主义原則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民主制的重重限制。对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細微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驗过貧穷困苦、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階級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論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来是很細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推出和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積極参加民主生活。

馬克思出色地暴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这一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的經驗時說：这就是容許被压迫者数年一次来决定压迫階級

的哪个代表应当在議會里代表和压迫他們！

但是这种必然是狹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虛伪和騙人的資本主义民主制，决不像一般自由主义的教授和小資产阶級的机会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朝着“日益徹底的民主制”發展的。不是的。向前發展，即向共产主义發展，必須經過無产階級专政，决不能走別的道路，因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

而無产階級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鋒队組織成为統治阶級来鎮压压迫者，不能仅仅限于扩大民主制。除了大規模地扩大这种第一次供貧民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之外，無产階級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剝削者、資本家采取一系列剝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傭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們必須鎮压这些人，必須用强力粉碎他們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鎮压和使用强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已經很好地闡明了这一点，他說：“無产階級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到了有可能来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

絕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剝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鎮压，即不允許他們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只有当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資本家已經消灭，阶級已經不存在的时候，即社会各个成員在对社会生产資料的关系上已經没有什么差別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称得上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备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在那个

时候，民主制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役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强力，不需要强制和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的这种特别的强制机关。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会引起抗议、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令人气愤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一次提供了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备的民主制，而民主制愈完备，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少数人镇压多数人的特别机器。很明显，为了达到剥削者少数始终压迫被剥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然要采取极凶恶极残酷的镇压手段，就必然会造成无数流血惨案，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经历过的。

其次，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特别的镇压机

关，特别的镇压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是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也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而且这种镇压同绝大多数居民的广泛的民主是不违背的，因而对特别的镇压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没有极复杂的镇压机器，剥削者就不能镇压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要有很简单的“机器”，甚至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别的机关，而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为完全不需要国家创造条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不否认个别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镇压机器，特别的镇压机关，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正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国家也会随着这种行为的消亡而消亡。

马克思并没有凭空幻想这个未来的远景，他只是更详细地确定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

間的差別。

###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关于工人在社会主义下將領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劳动产品”的思想。馬克思指出，在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須拿出一部分作后备基金、作扩大生产的基金和补偿“磨損了的”机器的費用等等，然后在消费品中还要拿出一部分作为管理费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样說些含糊不清的籠統的話（“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須怎样管理的問題作了冷靜的考察。馬克思在具体 分析这种沒有資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时說道：

“我們这里所說的”（在分析工人党的党綱时）“不是在自身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从資本主义社会里刚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帶有它脫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这个刚刚从資本主义脫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帶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

生产資料已經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員都担負某一部分社会所必需的工作，并从社会方面領得一张証書，証明他完成了多少工作量。根据这张証書，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儲藏中領取相当数量的产品。这样，除去作为社会基金的一部分劳动之外，每个工人就从社会方面領取相当于他所

貢獻的一份報酬。

這樣，似乎“平等”就實現了。

但是，拉薩爾把這樣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說成是“公平的分配”，說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这是錯誤的，馬克思就对他的錯誤进行了分析。

馬克思說：这里确实有“平等权利”，但这还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同别人相等的一份社会劳动，就能領取一份相等的社会产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然而每个人是不同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結了婚，有的没有結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

馬克思总结說，……“因此，在同样的劳动下，在平等地享受社会消費品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在实际上比另一个人領得多一些，这个人就会比另一个人富裕一些等等。为了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經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資料据为己有了。馬克思駁倒了拉薩爾关于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說法，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說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資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庸俗的經濟学家（包括資產階級的教授和“我們的”杜岡<sup>①</sup>在內）經常譴責社会主义者，說他們忘記了人与人的不平等，“梦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們看到，这种譴責只能証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的極端無知。

馬克思不仅極其准确地估計到人們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計到，仅仅把生产資料轉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說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仍然占着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法权”的不平等，因为产品是“按工作”分配的。

馬克思繼續說道，……“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經過长久的陣痛以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脫胎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决定的社会的文化發展”……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資產階級的法权”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發生的經濟变革範圍內，也就是在对生产資料的关系上取消。“資產階級的法权”承認生产資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則把生产資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範圍內，也只能在这个範圍內，“資產階級的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員間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調节者（決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則已經實現了；“按等量劳动領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則也已經實現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還沒有消除不同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領取等量产品的“資

① 指俄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杜岡·巴拉諾夫斯基。——譯者注



階級的法权”。

馬克思說，這是一個“缺點”，但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願陷入空想主義，那就不能認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人們立即就會不需要任何法規而為社會勞動，況且資本主義的廢除不能立即為這種變更創造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的法权”以外，沒有其他法規。所以在這個範圍內，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護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保護勞動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

那時國家就會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護容許在事實上存在不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法权”。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 4. 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

馬克思接着又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社會分工的現象已經消失，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对立也隨之消失，勞動已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的全面發展而增長，一切社會財富的資源都會充分地涌現出來，——只有在那時候，才能徹底打破資產階級法权的狹隘觀點，社會才能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寫在自己的旗幟上。”

現在我們才認識到，恩格斯無情地譏笑那種把“自由”和“國家”這兩個名詞連在一起的荒謬見解，是多麼正確。還有國家的時

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像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发展，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这种使人像夏洛克<sup>①</sup>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观点就会打破。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

① 夏洛克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典型的高利贷者。

——译者注

要”自由地領取。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說成是“純粹的烏托邦”，并冷嘲热諷地說社会主义者許过諾言，要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領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車、鋼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則可以不加任何監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諷刺的話来搪塞，但他們这样做只是暴露了他們的愚昧無知和为资本主义辯护的自私目的。

其所以說愚昧無知，是因为沒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許下共产主义高級發展阶段一定到来的“諾言”，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預見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会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無故地”破坏社会财富的儲藏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費量实行極严格的監督，不过这种監督应当从剝夺資本家和由工人監督資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僚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鉄里先生、切尔諾夫先生之流）为要达到替资本主义辯护的自私目的，就一味爭論和空談遙远的未来，而不談目前政治上的迫切問題；剝夺資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們和策烈鉄里先生、切尔諾夫先生之流談到荒誕的烏托邦，談到布尔什維克的蠱惑人心

的諾言，談到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們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但是，不仅誰也沒有許过“实施”共产主义高級阶段的諾言，而且連想也沒有想到“实施”，因为这根本不是可以“实施”的。

这里我們也就要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別問題，这个問題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說“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不恰当的一段話里已經談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級阶段之間的差別，在政治上說，将来也許很大，但現在在資本主义下着重來談它就很不可笑了，至于把这个差別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許只有少数無政府主义者（这是說，如果在克鲁泡特金之流，格拉弗、柯尔涅利逊以及其他無政府主义“大师”們“像普列汉諾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像一个沒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無政府主义者格耶所說的那样变成了無政府主义“衛國”战士以后，無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絲毫沒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別是很明显的。馬克思把通常所說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既然生产資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詞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終应用了唯物主义辯証法，即發展學說，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資本主义中發展出来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和“虛构”种种定义，也沒有从事毫無意义的字面上的爭論（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現共产主义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經濟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資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

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规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見，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內，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沒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这好像是奇談怪論，或只是一种聰明的辯証把戏，那些沒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义的極其深刻的內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譴責馬克思主义。

其实，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我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的情形。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资产阶级的”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刚从資本主义腹內脫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資本家、爭取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制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極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資本主义和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個阶段。

民主制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無产阶级爭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員在占有生产資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也就是說，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資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轉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至于人类会經過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須認識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虛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

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对人们使用有组织有系统的强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制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它们有可能去摧毁、粉碎、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警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达到这样高度的民主，就会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所有的人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所有的人”真正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而且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关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一天之内立刻推翻资本家和官僚，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统计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問題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統計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安排好”并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員。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全部問題在于要他們做同等的工作,正确完成工作量,領取同等的报酬。資本主义使这种統計和监督变得非常简单,成为一种非常容易、任何一个識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監察和登記的手續,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發發有关字据的手續<sup>①</sup>。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統計,对資本家(这时已成为職員)和保留着資本主义恶習的知識分子先生們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們就絕对無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無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無产階級在战胜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紀律,决不是我們的理想,也决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只是为了徹底肅清社会上資本主义剝削制造成的丑恶現象,并且为了繼續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員或至少絕大多数成員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業,并对一小撮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义恶習的先生們和深深受到資本主义腐蝕的工人們“安排好”监督的时候,任何管理都开始不需要了。民主制愈完备,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即由武装工人組成的、“已經不是原来意

① 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簡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統計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为“政治的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簡單的行政管理职能”(參看第四章第二节恩格斯同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義上的國家”愈民主，則一切的國家開始消亡也愈快。

當大家都學會了管理，實際上都自己來管理社會生產，自己來進行統計並對寄生蟲、老爺、騙子手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護者”實行監督的時候，企圖逃避這種全民的統計和監督就必然很難達到目的，必然只會是極少數的例外，並且還可能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懲罰（因為武裝工人是實事求是的，不像知識分子那樣抹不開情面；他們未必會讓人隨便跟自己開玩笑），這樣，人們對於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就會很快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于遵守了。

到那時候，從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它的高級階段的大門就會敞開，國家也就會完全消亡了。

## 第六章

### 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了

國家對社會革命的態度和社會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像一般革命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論家和政論家們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滋長而使第二國際在1914年破產的過程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甚至當他們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竭力迴避或者不加理會。

總的看來，我們可以說，由於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上採取了有利於機會主義、助長機會主義的迴避態度，結果就產生了曲解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完全庸俗化的現象。

為了簡要地說明這個可悲的過程，我們就拿最著名的馬克思



主义理論家普列汉諾夫和考茨基來說。

### 1. 普列汉諾夫与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普列汉諾夫写了一本專門論述無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問題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名字是“無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諾夫很巧妙地論述这个題目，对反对無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一般关于国家的問題完全避而不談！他的这本小册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納和蒲魯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無政府主义者与强盜沒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議論。

这两部分的結合，不但十分可笑，而且足以說明普列汉諾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在1905—1917年，普列汉諾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究，半庸人。

我們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無政府主义者論战时，極其詳尽地說明了自己是怎样看待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的。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时写道：“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时正在同以巴枯宁为首的無政府主义者作最猛烈的斗争，——那时离第一国际的海牙會議<sup>23</sup>閉幕才两年。”

無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布为他們“自己的”，認為它能証实他們的學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对这些教訓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等具体政治問題，無政府主义者連一个比較接近真

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過。

但是在談“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時迴避整個國家問題，不理會馬克思主義在公社以前和以後的全部發展，那就必然會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因為機會主義者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們剛才所指出的兩個問題。光是這一點，已經是機會主義的勝利了。

## 2.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在俄國文壇上，考茨基的著作的譯本無疑比其他國家多得無可計量。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開玩笑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還多（附帶說一說，在這個玩笑里含有比開這個玩笑的人所料想的更深刻得多的歷史內容：俄國工人在1905年對世界最優秀的社會主義文獻中最優秀的著作有空前強烈的要求，他們得到的這些作品的譯本也比其他各國多得無可比擬，這樣就把比較先進的鄰國的豐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國無產階級運動的所謂年輕的基地上來了）。

考茨基之所以在俄國特別出名，除了他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通俗的解釋以外，就是他同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進行了論戰。但是有一個事實幾乎是沒有人知道的。如果有人想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機尖銳時期怎樣最可耻地表現出張皇失措，墮落到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地步，那就不能放過它。這個事實就是：考茨基在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饒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就已經表現出很大的動搖。1901—190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旨在捍衛革命無產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的“曙光”雜誌<sup>24</sup>，曾不得不同

考茨基进行論战，并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sup>25</sup>上提出的決議叫做“橡皮”決議，因为这个決議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曖昧的，調和的，躲躲閃閃的。在德国的書刊中还刊载过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当我们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論战中，从他提問題和解釋問題的方法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国家問題上恰恰是一貫傾向于机会主义的。

我們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來說。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的遺臭万年的“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一書中，指責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資產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責来攻击革命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維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別談到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企圖（我們看到，这种企圖已經徹底失敗）把馬克思对公社的教訓的观点与蒲魯东的观点混为一談。伯恩施坦特別注意馬克思于1872年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結論，这个結論說：“工人階級不能简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格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曲解成机会主义的見解。

我們已經講过，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应当打碎、摧毀、炸毀（Sprengung——炸毀，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馬克思說這句話是警告工人階級不要在夺取政

權時採取過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像還有比這種曲解馬克思思想的行为更粗暴更丑惡的了。

而考茨基是怎樣最詳盡地駁斥伯恩施坦主義的呢？

他避免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根源。他引証了我們在前面引証過的恩格斯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序言中的一段話，說什麼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但一般來說它是能夠掌握這個機器的，如此而已。至於伯恩施坦把完全同馬克思的真正思想相反的話妄加在馬克思的身上，以及馬克思從1852年起就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負有“打碎”國家機器的任務，考茨基卻一字不提。

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問題上的最重要差別被考茨基抹殺了！

考茨基在“反對”伯恩施坦時寫道：“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我們可以心平氣和地留待將來去解決。”（德文版第172頁）

這不是反對伯恩施坦，同他進行論戰，實際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心平氣和地留待將來去解決”。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這四十年當中，教導無產階級應當打碎國家機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即當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卻用打碎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來代替要不要打碎這個機器的問題，把我們無法預先知道具體形式這種“無可爭辯的”（也是爭不出結果的）庸俗道理當做護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對無產階級政黨發動工人階級進行革命的任務所持的態度上，存在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們且拿考茨基的另一部更成熟的、多半也是為了駁斥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寫的著作來說。那就是他論“社會革命”的小冊子。作者在這裡把“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制度”問題作為專題來研究。作者發表了許多極寶貴的見解，但是恰恰沒有談到國家問題。在這本小冊子里，到處談的只是奪取國家政權，也就是說，考茨基的說法都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他認為不破壞國家機器也能奪取政權。馬克思在1872年認為“共產黨宣言”的綱領上已經“陳旧的”東西，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恢復了。

在這本小冊子里，有一節專門談“社會革命的形式與武器”問題。其中講到群眾性的政治罷工和國內戰爭，也講到“現代大國的強力武器即官僚和軍隊”，但是一个字也沒有提到公社給了工人一些什麼教訓。可見，恩格斯警告工人特別是德國社會主義者不要“崇拜”國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問題說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綱領”，接着就敘述了這個綱領的條文。至於1871年在以無產階級民主制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問題上所提出的一些新東西，他却一个字也沒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這種听起来好像“冠冕堂皇”的老一套的話來搪塞：

“不言而喻，在現行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取得統治地位的。革命本身預定要有一個長期的深刻的鬥爭，這個鬥爭一定會改變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

毫無疑義，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馬吃燕麥，伏爾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樣。所可惜的是他拿“深刻的”鬥爭一類空洞而浮夸

的話來迴避革命無產階級的迫切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對民主制的態度與以往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深刻的地方”究竟在  
哪裏。

考茨基迴避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但他在口頭上卻氣勢洶洶地向它宣戰，強調“革命思想”的意義（如果怕向工人宣傳革命的具體教訓，那末試問這種“思想”還有多大價值呢？），或者說“革命的唯心主義高於一切”，或者宣稱英國工人現在“幾乎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寫道：“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同時並存的可以有……各種形式上極不相同的企業：官僚的（??）、工聯的、合作社的、個人經營的”……“例如，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不可，鐵路就是這樣。在這裏，民主組織可以採取這樣的形式：工人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由這個議會制定工作條例並監督官僚機關的行政。有些企業可以交給工會管理，另外一些企業則可以按合作原則組織起來。”（見1903年日內瓦版俄譯本第148頁和第115頁）

這種論調是錯誤的，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訓做例子來說明的倒退了一步。

從所謂必須有“官僚”組織這一點看來，鐵路同大機器工業的一切企業，同任何工廠、大商店和大資本主義農場根本沒有區別。在所有這些企業中，技術條件要求每個人絕對嚴格地遵守紀律，要求每個人十分準確地執行他所擔負的一部分工作，不然就會有整個企業陷於停頓或機器和產品損壞的危險。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當然要“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

但是整個關鍵就在於這個“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不會是資產階級議會機關式的議會。整個關鍵就在於，這個“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不會僅僅“制定條例和監督官僚機關的行政”，像思想沒有超

出資產階級議會制范围的考茨基所想像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組成的“某种类似議会的東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关的”“行政”，可是这个机关却不是“官僚的”机关。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关打碎，把它徹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机关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換，（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資，（3）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監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沒有考虑馬克思的話：“公社不是議會式的，而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考茨基完全不了解資產階級議會制与無产階級民主制的区别，資產階級議會制是把民主制（不是供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連在一起，而無产階級民主制則立即采取办法来根除官僚制，并且能够把这种办法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制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又暴露了他对国家的“崇拜”和对官僚主义的“迷信”。

現在我們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之路”的小册子（好像沒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俄国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候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像1899年批評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只談一般的革命綱領，也不像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管社会革命到来的时期而泛論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談的是

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革命時代”已經來到的具體條件。

作者肯定地指出一般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和在這方面起特別巨大作用的帝國主義。在西歐“1789—1871年的革命時期”之後，東方從1905年起也開始了同樣的時期。世界大戰以驚人的速度日益逼近。“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革命為時過早了。”“我們已經進入革命時期。”“革命時代已經開始。”

這些話是說得非常清楚的。考茨基的這本小冊子應當成為衡量德國社會民主黨（包括考茨基本人）的言行的一個尺度；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答應要做的是什麼，而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卻墮落到怎樣下流的地步。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里寫道：“目前的形勢會引起這樣一種危險，使人們很容易把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看得比實際上溫和。”事實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原來就比人們想像的要溫和得多，要機會主義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雖然如此肯定地說革命時代已經到來，但是他在那本自稱為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里，卻又完全避開了國家問題。

所有這些迴避、保持緘默、躲躲閃閃的做法結合起來，就必然使他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來談一談。

德國社會民主黨好像以考茨基為代表聲明說：我仍然堅持革命觀點（1899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認革命的新时代已經到來（1909年）；但是，既然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那末我还是要反對馬克思在1852年說過的話而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與潘涅庫克的論戰中，正是這樣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的。



### 3. 考茨基与潘涅庫克的論战

潘涅庫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卢森堡、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經轉到“中派”立場，無原則地搖擺于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間。这个看法已經由战争充分証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馬克思主义的派別是錯誤的）或“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貧乏可憎。

潘涅庫克在一篇論国家問題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杂志 1912 年第 30 卷第 2 册）里，說考茨基的立場是“消極的激进主义”立場，是“毫無作为的等待論”。“考茨基不願看到革命的过程”（第 616 頁）。潘涅庫克这样提出問題之后，就来談我們所关心的关于無产階級革命对国家的任务問題。

他写道：“無产階級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無产階級革命的内容，就是用無产階級的强力武器去消灭和鏟除（Auflösung——直譯是解散）国家的强力武器……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結果是国家組織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終止。多数人的組織消灭占統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組織，从这里就証明多数人的組織的优越性。”（第 548 頁）

潘涅庫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詞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很清楚的。現在来看一看考茨基怎样反駁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無政府主义者之間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庫克則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 724 頁）

潘涅庫克的說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的其

他缺點因與本題無關，這裡暫且不談），考茨基恰恰是抓住了潘涅庫克指出的具有原則意義的實質，但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則性的問題上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立場，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了。他對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的論斷是完全不對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就在於：（1）馬克思主義者的目的是完全消滅國家，但他們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把階級消滅之後，在導向國家消亡的社會主義建成之後，這個目的才能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希望在一天之內完全消滅國家，他們不懂得實現這個目的條件。（2）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之後，必須徹底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新的由武裝工人組織組成的公社式的國家機器來代替它；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是，他們完全沒有弄清楚無產階級應當用什麼去代替它以及怎樣運用革命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認革命無產階級運用國家政權，否認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利用現代國家準備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無政府主義者則否認這一點。

在這個爭論中，反對考茨基而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潘涅庫克，因為馬克思正是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不能單純地奪取國家政權，也就是說，不能只是把舊的國家機關轉到新的人手中，而應當打碎、摧毀這個機關，用新的機關來代替它。

考茨基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而滾到機會主義者那邊去了，因為他正好完全抹殺了機會主義者所絕對不能接受的破壞國家機器的思想，把“奪取”只是解釋成獲得多數，這就替機會主義者留下了空隙。

考茨基為了掩飾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就採用了書呆子

的办法：“引証”馬克思自己的話。馬克思在1850年曾說必須把“強力完全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問道：潘涅庫克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嗎？

这不过是一套把戏，正像伯恩施坦說馬克思主义和蒲魯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証”是牛头不对馬嘴的。無論用旧的国家机器或用新的国家机器，集中制都是可能實現的。工人們自願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集合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国家的集中机关即常备軍、警察和官僚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騙手段，对大家都知道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論避而不談，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題的引証来。

考茨基繼續写道：“也許是潘涅庫克想要消灭官僚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們無論在党組織或在工会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說在国家行政机关內了。我們的綱領不是要求消灭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現在我們談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行政机关要采取怎样的形式，而是在我們取得国家政权以前（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我們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löst——直譯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消灭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不，現在內閣中没有一个部是我們反政府的政治斗争可以取消的…… 为了避免誤会，我再重复一遍：現在談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党将賦予‘未来的国家’怎样的形式，而是我們作为反对党應該怎样去改变现在的国家。”（第725頁）

这显然是强詞夺理。潘涅庫克提出的正是革命問題。这無論在他的那篇論文的标题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話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考茨基跳到“反对党”問題上去，这正說明他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来代替革命的观点。他得出了这样的結論：現在我們是反对党，到取得政权以后我們再来專門談吧。革命不見了！这正是

機會主義者所需要的。

這裡所說的不是反對黨，也不是一般的政治鬥爭，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行政機關”和整個國家機關，用武裝工人組成的新機關來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對“內閣”的“崇拜”，試問，為什麼不可以由——譬如說——擁有全權的工兵代表蘇維埃設立的各种專家委員會來代替“內閣”呢？

問題的本質完全不在於是否保留“內閣”，是否設立“專家委員會”或其他什麼機關，這根本不重要。問題的本質在於：是保存舊的國家機器（它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浸透了因循守舊的惡習）呢，還是把它破壞並用新的來代替它。革命不應當是新的階級利用舊的國家機器來指揮、管理，而應當是新的階級打碎這個機器，利用新的機器來指揮、管理，——這就是考茨基所抹殺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關於官吏的問題，清楚地表明他不了解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的學說。他說：“我們無論在黨組織或在工會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們在資本主義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勞動群眾受資本主義的奴役。在資本主義下，由於僱傭奴隸制和群眾貧困的整個環境，民主制被縮小，壓抑並閹割得殘缺不全了。因為這個緣故，而且僅僅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負責人被資本主義環境腐化了（确切些說，有被腐化的趨勢），有變為官僚的趨勢，也就是說，有變為脫離群眾、站在群眾頭上的特權者的趨勢。

這就是官僚主義的實質，在資本家被剝奪以前，在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前，甚至無產階級的負責人也不免會在一定程度上“官

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被选举出来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下官吏也还会存在，官僚制也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把“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去代替议会制机关。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的那个绝妙的理由，就是过去的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斯坦在他的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中，激烈反对“原始的”民主制思想，反对他所称为“教条主义的民主制”的东西，即绝对服从选民的委托，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的”民主制不中用，伯恩斯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解释的英国工联的经验。据说，工联根据自己七十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来代替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徹底的资本主义奴隶制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制度下，自然“不得不”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不公平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行政机关之外的现象作种种让步。在社会主义下，“原始的”民主制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自己来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自

己來參加日常管理。在社會主義下，所有的人將輪流來管理，因此很快就會習慣於不要任何人來管理。

馬克思用自己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在公社所採取的實際辦法中看到了一個轉變，機會主義者因為胆怯、因為不願意與資產階級決裂而害怕這個轉變，不願意承認這個轉變，無政府主義者則由於急躁或一般不懂得大規模社會變動的條件而不願意看到這個轉變。“連想也不要想破壞舊的國家機器，我們沒有內閣和官吏可不行呵！”——機會主義者就是這樣議論的，他們滿身市儈氣，實際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創造力，而且還對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害怕革命一樣）。

“只須考慮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不着探究以往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教訓，也用不着分析應當用什麼和怎樣去代替破壞了的东西。”——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是指無政府主義者當中的優秀分子，而不是指那些跟着克魯泡特金先生之流去做資產階級尾巴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這樣議論的，所以他們就採取絕望的策略，而不採取那種以大無畏的精神進行革命工作、根據群眾運動的實際條件完成具體任務的策略。

馬克思教導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教導我們要勇氣百倍地去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又教導我們要具體地提問題，要看到公社在數星期內就能夠開始建立起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並實行上述種種辦法來擴大民主制和根絕官僚主義。我們要學習公社社員的革命勇氣，要把他們的實際辦法看成是實際迫切需要並能立刻實現的初步經驗，如果沿着這樣的道路前進，我們就能徹底消滅官僚主義。

消滅官僚主義的可能性是有保證的，因為社會主義將縮短勞

动日，发动群众去建设新生活，使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毫无例外地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顺从(*entgegenkommende*)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Verschiebung*)……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居于政府之上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有一个“顺从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比较起来是倒退了，落到了庸俗的地步。

考茨基一定会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因为他们都赞成争取一个“顺从无产阶级的”政府。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奋斗，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执政者。这是“二者之间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一定会成为列金、大衛、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因为他们完全同意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争取“议会中的多数和居于政府之上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目的，它是机会主义者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点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范围。

我們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無产階級会同我們一起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無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sup>26</sup>派（列金、大衛、科尔布等人，其中还包括斯塔的那维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时有饶勒斯派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时有费边社分子和“独立党人”<sup>27</sup>（即“独立工党”，实际上它是始终依附自由派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先生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的而且往往是主要的作用，他们公开否認無产阶级专政，鼓吹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無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多大区别。

根据这种情况，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第二国际絕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經完全滾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們不仅忘記了公社的經驗，还要把它加以歪曲。他們沒有教导工人群众說，工人們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用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統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他們不但沒有这样教导工人群众，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他們对“夺取政权”的了解，也給机会主义者留下了無數空隙。

現在，为了解决究竟由英国或德国、由这个財政資本或那个財



政資本来統治世界的爭執，国家及其因帝国主义竞赛而加强的軍事机关已經变成了屠杀千百万人民的軍事怪物，在这个时候曲解和抹杀無产階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就不能不产生極大的影响<sup>①</sup>。

① 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

## “第七章

### 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經驗

这一章的題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書来論述它。自然，在这本小冊子里只能談一談与無产階級在革命中对国家政权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手稿到此中断。——編者注）

## 初 版 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两月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經驗”的大綱。但是,除了題目以外,我連一行字也沒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書第二部分(关于“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經驗”)也許要拖延很久才能写出,因为做出“革命的經驗”总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

作 者

1917年11月30日于彼得格勒

写于1917年8—9月

1918年由“生活和知識”出版社  
出版单行本

按1919年“共产党人”出版社  
出版的小册子原文刊印,并根据  
手稿和1918年的版本做过校訂

## 注 釋

- 1 “国家与革命”一書是列宁1917年8—9月在秘密状态中写成的。列宁在1916年下半年就認為有必要从理論上探討国家問題。当时他写了一篇短評“青年国际”（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163—167頁），在这篇短評里他批評了布哈林在国家問題上的反馬克思主义立場，并答应写一篇文章詳細地論述馬克思主义对国家問題的觀點。列宁在1917年2月17日（新历）給亞·米·柯倫泰的信中談到，他差不多已經把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問題的材料准备好了。这些材料是用很小的字体写在以“馬克思主义論国家”为标题的藍皮筆記本里的。筆記中的材料有的摘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的摘自考茨基、潘涅庫克和伯恩施坦的著作并有列宁的評語、結論和概括。

“国家与革命”一書按原定計劃有7章，最后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經驗”列宁没有写，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章的詳細提綱（見“列宁文集”1983年俄文版第21卷第25—26頁）。关于出版这本書的問題，列宁在給出版者的信中写道，如果他“实在来不及写完第七章，或者这本書太厚，那末可以把前6章单独出版，作为第一分册……”。

在手稿的第1頁上，作者用的笔名是“弗·弗·伊万諾夫斯基”。列宁預計用这个笔名可以出版这本書，不然就会被临时政府沒收。但是这本書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也就不需要再用笔名了。第2版是在1919年出的，列宁在第二章中加了“1852年馬克思对問題的提法”一节。——（扉頁）

- 2 費边社分子 是一部分英国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極端机会主义的“費边社”的成員。該社以古羅馬大将費边·

孔克达特(“緩进者”)命名。費边素以緩进待机、迴避决战著称。用列宁的話說,費边社“最完备地表达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所采取的工人政策”。費边社分子誘惑無产階級脫离階級斗争,鼓吹用改良办法由資本主义和平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1914—1918年),費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場。关于費边社分子的評定,可以看列宁的如下著作:“‘約·非·貝克尔、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卷第354—355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卷第151頁)、“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論”(“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237—238頁)等。——(正文第1頁)

- 3 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16頁)。

在本書第6、8—12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同上第317—320頁)。——(正文第4頁)

- 4 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1948年俄文版第264—265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4—295頁)。

在本書第16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同上第190頁)。——(正文第13頁)

- 5 見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1941年俄文版。——(正文第17頁)

- 6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8—41頁)。——(正文第17頁)

- 7 見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11—47頁)。

哥达綱領是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爱森納赫派和拉薩尔派(当时这两派都是德国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联合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綱領。这是一个做头做尾的机会主义綱領,因为爱森納赫派在一切重大問題上向拉薩尔派讓步,接受了拉薩尔派的意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予哥达綱領以歼灭性的批判。——(正文第17頁)

- 8 見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1941年俄文版第148—149頁。——(正文第19頁)
- 9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1948年俄文版第63、78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0、28頁)。——(正文第19頁)
- 10 見馬克思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08—309頁)。  
在本書第25—27頁上，列寧引用了恩格斯為該書第3版寫的序言(同上第221—222頁)。——(正文第23頁)
- 11 “新時代”(«Die Neue Zeit»)雜誌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雜誌，1883年至1923年在斯圖加特出版。1885—1895年“新時代”雜誌曾發表過恩格斯的几篇文章。恩格斯經常向該雜誌編輯部提出意見，並因它背棄馬克思主義而給予尖銳的批評。從90年代後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以後，該雜誌系統地刊載了修正主義者的文章。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年)，該雜誌採取了考茨基中派立場，支持社會沙文主義者。——(正文第28頁)
- 12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53年俄文版第63頁。——(正文第28頁)
- 13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1948年俄文版第9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頁)。——(正文第31頁)
- 14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53年俄文版第263頁。——(正文第32頁)
- 15 見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498—499頁)。

在本書第38、38—39、44—48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馬克思的這一著作(同上第498—500、501頁)。——(正文第36頁)

- 16 見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549—550頁)。

在本書第50—51、51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這一著作(同上第605、589頁)。——(正文第50頁)

- 17 列寧指的是馬克思的“政治上的漠不關心”一文和恩格斯的“論權威”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版第15卷第88—95頁和第184—187頁)。

在本書第52、53、54—55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這兩篇文章(同上第88—91、186、186—187頁)。——(正文第52頁)

- 18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47年俄文版第296頁。——(正文第57頁)

- 19 愛爾福特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1891年10月在愛爾福特召開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用來代替1875年的哥達綱領。恩格斯在“對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的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16卷第2部第101—116頁)一文中批判了愛爾福特綱領的錯誤。

在本書第59—65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這篇文章(同上第105—111頁)。——(正文第59頁)

- 20 指恩格斯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所寫的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452—464頁)。

在本書第66、67、67—70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這篇序言(同上第454、458、462—464頁)。——(正文第66頁)

- 2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16卷第2部第386—387頁。——(正文第71頁)

- 22 見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0—31頁)。

在本書第76、81、82—84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馬克思的這篇文章(同上第31、21—23頁)。——(正文第75頁)

- 23 第一國際海牙會議於1872年9月2—7日(新曆)舉行。馬克思和

恩格斯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65名代表。列入議程的問題有：(1)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利；(2)关于無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等。代表大会的全部工作是在同巴枯宁派作尖銳的斗争中进行的。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权利的決議。代表大会就“無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問題所通过的決議中說道，無产阶级应当組織自己的政党以保証社会革命的胜利，無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和吉約姆被开除出国际，因为他們是破坏者和新的反無产阶级政党的組織者。——(正文第92頁)

- 24 “曙光”杂志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編輯部于1901—1902年在新加坡出版，共出了4期(3册)。在“曙光”杂志上刊载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評”、“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一書的前4章(标题为“土地問題的‘批評家’先生們”)、“內政評論”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綱領”。——(正文第93頁)

- 25 指1900年9月23—27日(新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五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791名代表。俄国代表团由28人組成。在無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根本問題上，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考茨基提議的列宁称之为“对机会主义者采取調和态度的”決議。除了其他決議以外，代表大会还决定設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由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組成，并設書記处于布魯塞爾。——(正文第94頁)

- 26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国际机会主义的机关刊物之一；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1914—1918年)，它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場。該月刊从1887年到1933年在柏林出版。——(正文第107頁)

- 27 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于1893年成立。該党的首領是詹姆斯·凱尔-哈第、拉·麥克唐納等。独立工党自命在政治上不依賴无产阶级的政党，实际上是“不依賴社会主义，而依賴自由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1914—1918年)独立工党最初發表宣言反对战争(1914年8月13日[新历])，之后，在1915年2

月协約国社会主义者倫敦代表會議上，独立党人同意代表會議通过的社會沙文主义的決議。从那时起，独立党首領以和平主义的詞句打掩护，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場。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左派党员群众的压力下，独立工党的首領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的決議。1921年独立党人参加了所謂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半国际瓦解后，他們重新加入了第二国际。1921年，英国独立工党的左翼脱离該党，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正文第107頁）

---